

# 从悟达国师经历看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德 光

**【内容提要】**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以来，僧侣与皇室的往来就一直存在。纵观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佛教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佛教的慈悲、包容精神和因果理念，让中国的历代帝王都无法回避与舍弃佛教。政治的强权、专制，也让佛教不得不依附于它。历朝僧团的沙门都与君王有着密切的交往。两千多年来，对国家政治有影响的僧人不计其数，有的甚至对国家前途和命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朝悟达知玄国师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僧人，他一生经历了五代皇帝，既有对其尊重有加，护持佛法的，也有打击佛教，毁灭佛教的。本文旨在通过对悟达国师一生与皇室交往的传奇经历为引子，试着窥探和分析中国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关键词】** 悟达知玄 国师 僧侣

**【作 者】** 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 2015 级研究生。

## 一 引言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僧人与皇室的往来就没有断绝过，历朝以来僧团的沙门和君王常有密切的合作来往，其中有辅弼朝政被尊为国师者，比如清凉澄观受到唐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等皇帝的敬崇，被尊为七帝国师；或有转而出仕朝中贵为宰相者，如南朝的慧琳和尚；或有一度出家为僧再为人君者，如朱元璋；更有舍弃九五之尊剃度出家者，如梁武帝。对于国家政治有深远影响的

出家人则更是不计其数，他们用佛家的智慧引导朝政，影响帝王。可以说，两千年来，对国家政治有深远影响的僧人历代都有，有的甚至对国家的前途命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悟达国师知玄就是这样一位大德，他在弘法过程中与皇室保持了比较密切的关系。在长安期间，他向唐文宗宣讲佛法，与唐武宗辩论。“会昌法难”后，受唐宣宗钦重，为佛教的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唐懿宗曾赠给他沉香宝座。黄巢起义后，唐僖宗在四川避难期间赐予他“悟达国师”称号。这种种都体现了知玄在当时的影响力和在佛教史上的地位。知玄亲身经历了佛教由盛而衰，再复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凭借着自己的智慧、胆识和勇气与皇室小心翼翼地交往，借助皇室对其本人的认可为佛教争取了发展空间。知玄在修行、义解、神迹等方面多有大成，上述特点前人的研究中多有涉及，笔者不再作重复研究，今仅通过悟达国师的经历来略论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 二 悟达国师知玄经历

佛教史料和正史中有关悟达国师知玄的资料并不多，最主要是《宋高僧传》卷六《知玄传》，此外便是《佛祖统纪》《佛祖历代通载》《释氏稽古略》《新唐书》《旧唐书》等的记载。其中《宋高僧传》卷六《知玄传》对知玄一生的经历记载最为详细。

释知玄，字后觉，姓陈氏，眉州洪雅人也。曾祖图南任梓州射洪县令，祖宪考邈皆名场不捷。母魏氏梦月入于怀，因而载诞。虽乳哺未能言，见佛像僧形必含喜色。五岁，祖令咏花，不数步成云：“花开满树红，花落万枝空。唯余一朵在，明日定随风。”祖吟叹不怿曰：“吾育此孙，望其登甲科，雪二代之耻。今见孺子志矣，非貽厥也，已必从空门，乖始望也。”

七岁，果遇法泰法师在宁夷寺讲《涅槃经》。寺与居邻，玄日就讲集所，一聆法语若睹前因。是夕，梦其寺殿佛手摩其顶，寤启祖父，乞为勤策。亲党观其必不可抑夺，故听之。

年十一，遂其削发，乃随师诣唐兴邑四安寺。授《大经》四十二卷，远公

《义疏》，辩空师《圆旨》，共一百二十五万言，皆囊括深奥矣。

方年十三，指撻缙徒露老成之气。时丞相杜公元颖作镇西蜀，闻玄名，命升堂讲谈于大慈寺普贤阁下，黑白众日计万许人，注听倾心，骇叹无已。自此蜀人弗斥其名，号“陈菩萨”耳。传云“玄前身名知铉，汉州三学山讲十地经，感地变琉璃焉。”玄于净众寺辩贞律师所受具戒，才听《毘尼》续通《俱舍》，则长十山固律师之付授焉。

复从本师下三峡，历荆襄抵于神京资圣寺，此寺四海三学之人会要之地。玄敷演经论，僧俗仰观，户外之履日其多矣。文宗皇帝闻之宣入顾问，甚愜皇情。后学《唯识论》于安国信法师，又研习外典，经籍百家之言无不该综。玄每恨乡音不堪讲贯，乃于象耳山诵《大悲咒》，梦神僧截舌换之，明日俄变秦语矣。有杨茂孝者，鸿儒也，就玄寻究内典，直欲效谢康乐注《涅槃经》，多执卷质疑，随为剖判。致书云“方今海内龙象非师而谁？”次扬刑部汝士、高左丞元裕、长安扬鲁士，咸造门拟结莲社。尝一日玄宴坐，见茂孝披紫服戴碧冠三礼毕乘空而去，玄令人侦问。茂孝其夕诫其子曰“吾常欲落发，披缙汲瓶挈屣侍玄公，所累者簪冕也。吾盖棺时殓以紫袈裟碧芙蓉冠。”至是方验先见矣。

武宗御宇，初尚钦释氏，后纳蛊惑者议，望祀蓬莱山筑高台以祈羽化，虽谏官抗疏宰臣屡言，终不回上意。因德阳节缙黄会麟德殿，独诏玄与道门敌言，神仙为可学不可学耶？帝叉手付老氏中理大国若烹小鲜义，共黄冠往复。玄陈帝王理道教化根本言，神仙之术乃山林间，匹夫独擅高尚之事业，而又必资宿因，非王者所宜，辞河下倾辩海横注，凡数千言，闻者为之股栗。大忤上旨，左右莫不色沮。左护军仇士良、内枢密杨钦义，惜其才辩，恐将有斥逐之命，乃密讽贡祝尧诗。玄立成五篇，末章云“生天本自生天业，未必求仙便得仙。鹤背倾危龙背滑，君王且住一千年。”帝览诗微解。帝虽不纳忠谏，而嘉其识见口给也。玄即归巴岷旧山，例施巾栉，而存戒检愈更甄明。方扁舟入湖湘间，时杨给事汉公廉问桂岭，延止开元佛寺。

属宣宗龙飞，杨公自内枢统左禁军，以册定功高请复兴天竺教。奏乞访玄声迹，玄复挂坏衣归上国宝应寺，属寿昌节讲赞赐紫袈裟，署为三教首座。帝以旧藩邸造法干寺，诏玄居寺之玉虚亭。大中三年诞节，诏谏议李贻孙、给事杨汉公、缙黄鼎列论义，大悦帝情。因奏天下废寺基，各敕重建。大兴梵刹玄

有力焉，命画工图形于禁中，其优重如是。与相国裴公休友善，同激扬中兴教法事。八年，上章乞归故山大行利济，受益者多。

广明二年春，僖宗违难西蜀，后遣郭遵泰赍玺书，肩舆诏赴行在。帝接谈论颇解上心，左军容田令孜与诸达官问道勤重，帝欲旌其美，令诸学士撰玄师号，皆未惬旨，乃挥御翰云“朕以开示悟入法华之宗旨也，悟者觉也明也，悟达大道悟佛知见。”又云“悟者一刹那，不悟河沙劫，所以悟者真乘了然成佛之义。今赐‘悟达国师’为号。虽曰强名，用表朕意。”玄陈让不遂，乃乞归九陇旧庐。

于正月二十一日卧内见所曾游历，圣境名迹皆见在前。二月七日闻空声曰：“必生净土。”乃讯之云“孰之语耶？”空又应曰“佛也。”七月中，闻户外有格斗之声，逡巡一菩萨降于庭前事磨灭矣，渐迫仅玄身丁宁赞喻，勿以此苦为累也，言讫而没。又于一夕有一珠，自玄左足下流去，苦楚万端。谛视其珠中明明有“晁错”二字，乃知玄是袁盎也。曾因七国反，盎奏斩错以谢吴楚诸王，故为婴挠耳。召弟子慈灯，附口上遗表，嘱令弃尸半饲鱼腹半啖鸟兽。吾久与西方净土有期如斯，誦诤讫右胁，面西而逝。享年七十三，僧腊五十四。<sup>①</sup>

从上文可知，释知玄（810~882），字后觉，俗姓陈，四川省眉州洪雅人。知玄7岁的时候开始接触佛法，在家乡宁夷寺向高僧法泰学习《涅槃经》。11岁剃发，随师父到唐兴邑四安寺出家。13岁时，知玄已经学业有成，颇有名气。当时丞相杜元颖坐镇西蜀。听闻知玄大名，请他前来官府讲谈。他在成都大慈寺普贤阁讲经，听众日计万人，蜀人尊称他为“陈菩萨”。知玄后来来到长安资圣寺敷演经论，僧俗仰观。唐文宗崇礼如师。唐武宗执政后，崇道灭佛，知玄代表佛教一方上殿与道士论战，后来回到了巴岷家乡。武宗去世，宣宗即位后，佛教重新公开活动，朝廷赐知玄紫袈裟，并且敕封为“三教首座”，曾经襄助宣宗复兴佛教，功绩炳然。黄巢起义，僖宗逃往西蜀之时与知玄相谈甚欢，僖宗欲旌其美，赐知玄“悟达国师”为号。中和二年（882）知玄面西而逝，往生西方净土，享年73岁，僧腊54。

知玄总共经历了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唐懿宗、唐僖宗五任皇帝。据《宋高僧传》卷六记载，文宗皇帝对知玄崇礼如师，唐宣宗赐其紫袈裟，并敕封其为

<sup>①</sup> 《宋高僧传》卷6，《大正藏》第50册，第744页下。

“三教首座”，唐僖宗更是赐其“悟达国师”称号。《佛祖统记》卷四十二记载，唐懿宗赐其沉香宝座。五位皇帝中除了唐武宗的灭佛运动外，其他四位皇帝对知玄都礼遇有加。唐武宗也曾经让知玄公开与道教进行辩论，能作为僧人的代表去与道教辩论，本身也很能说明知玄在当时佛教中的威望和地位。

知玄在唐末佛教的地位，是由他的道德、学问及政治影响力确立的。赞宁称赞知玄“多才行道，近古罕闻”<sup>①</sup>。知玄撰述丰富，首先是一个“义解僧”；其次，他修行精进，持戒精研，是“修行僧”；另外，其曾为大鱼、龙门神授归依戒法，为李商隐医治眼病，又被称为“神通僧”；与皇室的甚深交往又体现出其是一个“政治僧”。知玄以其渊博的学识和智慧不仅为佛教在当时的的发展做出了诸多贡献，也为自己在史界留下了美名。

### 三 知玄生平事迹及其对政治的影响

知玄一生大体可以分为早年在四川的时期，受戒后在长安游学和兴教时期以及晚年在四川的时期。其早年在四川的学习积累为其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后在长安游学和兴教时期广泛接触皇帝和诸宰辅大臣，晚年回到四川。知玄中期对政治影响最大，晚期在四川受唐僖宗礼遇，被赐“悟达国师”称号，其对政治的影响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 （一）早年在四川时期

释知玄（810～882），字后觉，俗姓陈，四川省眉州洪雅人。5岁时曾赋诗云：“花开满树红，花落万枝空。唯余一朵在，明日定随风。”<sup>②</sup>知玄7岁开始接触佛法，在家乡宁夷寺向高僧法泰学习《涅槃经》。11岁披剃，随师父到唐兴邑四安寺出家。知玄13岁时，奉丞相杜元颖之命，升堂说法于大慈寺。其作为沙弥登坛讲法，这成为了历史的一段佳话。当时知玄是奉丞相杜元颖之命说法。18岁时随净众寺辩贞律师受戒，学习戒律及《俱舍》。

这段时期主要是知玄接触佛法、学习佛法的积累阶段，但是小小年纪已然崭露

<sup>①</sup> 《宋高僧传》卷6，《大正藏》第50册，第744页下。

<sup>②</sup> 《宋高僧传》卷6，《大正藏》第50册，第743页上。

头角，开始被重视，沙弥身份即开始登坛说法，这为以后其弘扬佛法，影响政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 （二）长安游学和兴教时期

知玄受戒后随法泰到达长安的资圣寺<sup>①</sup>。知玄在资圣寺敷演经论，受僧俗崇仰。文宗皇帝闻名后，曾宣入宫内请益佛法，甚惬皇情。不久，于安国信法师处广学《唯识论》，另外自己研习外道典籍、诸子百家等，无不通达。

唐武宗时期，知玄不畏惧强权，在与道教辩论及面对武宗提问的过程中表现出过人的胆识和智慧。武宗灭佛，知玄被迫返回四川。返回四川之后，知玄曾经坐船去湖南，其间结识杨汉公，后来知玄的复出也是因杨汉公的举荐。

大中元年（847）唐宣宗下令恢复佛教，宣宗承认佛教的确是外来宗教，然而也认可其是真理与美德的根源。复佛后，杨公寻访到知玄，让其在宝应寺讲法，宣宗赐其紫袈裟，称其为三教首座。大中三年（849）六月，唐宣宗下令恢复已经停顿六年之久、由三教代表于皇帝诞辰日举行的谈论，知玄利用这个机会请愿大规模重建佛教寺院。

《佛祖统计》载，唐懿宗时期，知玄被赐予沉香宝座，可见当时知玄备受皇帝重视。知玄在长安游学期间不仅受到皇室的礼遇，与士大夫阶层和官员也有密切交往，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李商隐和相国裴休。李商隐妻子死后开始信佛，先结识知玄弟子僧彻，后认识知玄，知玄曾寄偈为他治眼病。李商隐在临终前，还写了一首《别智玄法师》诗寄给知玄。《宋高僧传》记载“与相国裴休友善，同激扬中兴教法事。”<sup>②</sup>裴休对知玄的政治生活和佛教的复兴事业影响很大。裴休（约787~860）是唐末有名的居士，他属于义解型的居士，与高僧澄观、宗密、端甫、知玄都有很深的师友之谊。前面三位高僧在会昌废佛前相继入寂（端甫是836年，澄观是839年，宗密是841年）。知玄是在882年入寂，而裴休的卒年是860年，所以至少有二十年的时间，知玄与裴休通力合作，尽力于会昌废佛以后的佛教再兴。

知玄长安游学和兴教时期是其一生中最主要的弘法时期，其间知玄经历了佛教由受重视到被打击，再到重新恢复的一个过程。不管是佛教兴盛还是遭遇灭佛运动，

<sup>①</sup> 资圣寺，在长安的崇仁坊，本是太尉长孙无忌宅，龙朔三年（663），为文德皇后追福，立为尼寺，咸亨四年（673）改为僧寺。见《唐会要》卷48，中册，中华书局，1955，第846页。

<sup>②</sup> 《宋高僧传》卷6，《大正藏》第50册，第743页中。

知玄始终都不卑不亢地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佛教受重视，他就尽力去宣扬佛法，佛教遭受打击，他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抗争和保护。在弘扬佛法和保护佛教的过程中知玄或多或少的受到政治势力的影响，而他自身也因其强大的悲愿力和人格魅力影响着帝王和诸政治势力。

### （三）晚年在四川

知玄晚年回到了四川，但是没想到晚年竟然又受到了皇帝的礼遇。广明二年春，唐僖宗因黄巢起义而躲逃到西蜀，听闻知玄盛名，遣使臣招引相见，谈论颇解僖宗心意。唐僖宗欲赐其雅号，诸学士所献皆不如意，白云“朕以开示悟入法华之宗旨也，悟者觉也明也，悟达大道悟佛知见。”又云“悟者一刹那，不悟河沙劫，所以悟者真乘了然成佛之义。今赐‘悟达国师’为号。”<sup>①</sup>

## 四 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从悟达国师的经历能管窥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大体表现为“既冲突又相辅”的格局，一致的部分表现为：统治者为了国家政治的需要拉拢僧侣，帮助弘扬佛法，同时借助佛教影响来稳定国家，辅助政治；冲突的部分表现为：一旦佛教影响了国家利益，帝王就会对佛教打击毁灭，迫害佛教徒。知玄经历的五代皇帝，就是典型的这种情况。文宗时期，国家稳定，文宗向知玄请益佛法。武宗时国家经济出现困难，武宗与知玄当庭辩论，知玄虽据理力争，但其后还是遭遇会昌法难。武宗死后，宣宗即位，重新开始发展佛教，知玄被宣宗钦重，主持恢复佛教。再后来懿宗赐其沉香宝座，僖宗封其为国师。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沙门就用佛家的智慧引导朝政，影响帝王。

### （一）僧侣对政治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僧侣对政治的影响就一直存在。有的出家人影响政治，有的出家人直接参与政治，而有的出家人则直接登上皇帝宝座。明太祖朱元璋早先当过沙弥，后来开创了大明朝，自己登上九五之尊的宝座。正因为其早年与佛教的缘分，在他即位后极大地支持佛教发展，建寺度僧，印制经书等。在中国佛教历史中

<sup>①</sup> 《宋高僧传》卷6，《大正藏》第50册，第744页上。

还曾出现过三位宰相级别的法师 《佛祖历代通载》(元释念常撰)载“时有僧惠琳者,以才学得幸于帝与决政事,时号黑衣宰相。”<sup>①</sup>惠琳是沙门参政之肇始。《释氏稽古略》(元觉岸编)载“帝以释明瞻善识治方,诏入内殿赐斋。对诏广陈帝王制御之术,叙释门慈救为宗。帝大悦,因下敕年三月六日普断屠杀,于行阵之所皆置佛寺。”<sup>②</sup>明瞻法师善治国之法,被唐太宗封为帝相。《补续高僧传》(明明河撰)载“师道衍公,有辅翼居守功。及即位,召衍,至自北京,命主教事,师以左善世逊衍。”<sup>③</sup>明代的道衍法师帮助燕王朱棣夺得天下,最后被封为“荣国公”,位及宰相。除了上述僧侣直接参与政治的情况之外,还有许多法师被封为国师,间接影响着政治。《佛祖统记》(宋志磐撰)载“天保元年,诏高僧法常入内讲《涅槃经》,拜为国师。”<sup>④</sup>国师之名由此开始,后面先后有五十二位法师被敕封为国师,包括南朝陈宣帝拜智者大师为国师,元世祖封海云法师为国师,清顺治帝尊玉琳为国师等。

## (二) 佛教对政治的依附

佛教在影响政治的同时也要依附于政治势力。佛教传到中国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大部分时间处于封建社会时期,基本是一个皇权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高度的集权决定了任何宗教信仰都必须依附于王权,为之统治服务。东晋高僧道安法师曾经说过“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sup>⑤</sup>,古往今来莫不如此。

佛教在传入的过程中,对政治的依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文化内涵上要寻求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和统治者的认可。佛教想要广泛的弘扬和传播首先要融入本土,需要获得当政者的理解和支持。不融入则难以立足,不获得统治者的支持则难以发展。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就不断地努力融入本土文化和寻求帝王的支持,尤其是大乘佛法兴起后,皇权更是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劝诫王颂》和《宝行王正论》就是将孝悌和忠君思想融入佛法调和佛教与本土文化的代表论著。二、思想理论上既要有自己的独立性,还要听命于王权,并为其服务。佛教对于中土而言属于外来宗教,如果想生存则必须从思想意识形态上与王权保持一致,还不能失去自己的本怀精神。这就需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度,在宣扬佛教的同时,适当地为统治者服

① 《佛祖历代通载》卷8,《大正藏》第49册,第536页下。

② 《释氏稽古略》卷3,《大正藏》第49册,第813页中。

③ 《补续高僧传》卷25,《大正藏》第77册,第528页上。

④ 《佛祖统记》卷38,《大正藏》第49册,第356页下。

⑤ 《高僧传》卷5,《大正藏》第50册,第352页上。



务，以寻求统治者的支持；三、现实中以帝王为原型造立佛像。佛教把帝王视为现世佛，并为其造立佛像，抬高帝王在宗教界的地位，使其在宗教界获得认可。北魏时期开凿的“昙耀五窟”是昙耀依据北魏五朝五代皇帝原型而造立的巨型佛像。这一方面能够获得帝王的支持，另外一方面也为佛法的弘扬扫清障碍。这显示出了佛教的国家性格和世俗化，佛教以恰当的方式依附王权既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也为佛教在中土的流传铺平了道路。

### （三）政权对佛教的打击和利用

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时期，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压迫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即便是在君王比较开明的盛世依然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佛教教义对于残酷的社会现实来说是非常能够缓解种种社会矛盾的。佛教宣扬因果理论和慈悲的观念，统治者则利用佛教这些理论和观念为其消除社会怨恨，培养顺民。政治的强硬手段有时候不能很好地起到调服人心的效果，因此统治者积极寻求佛教的帮助，使人们从心理上能够认同统治者的管理和接受现实。自两汉到明清，二十八个朝代，历朝无不倡导佛教，其用意即在于此。梁武帝自号“皇帝菩萨”；隋炀帝则自称“总持菩萨”；武则天称自己为“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明武宗把自己封为“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乾隆自称“佛心天子”；慈禧自命“老佛爷”。这些自号与称呼，都说明了帝王们对佛教的利用。

除了利用佛教的理念，统治者还专门设立僧官等直接对佛教加以统治利用。根据《大宋僧史略》《佛祖统纪》等史料记载，自汉代至西晋之间，为中国佛教之初传期，寺院、僧尼不多，当时有关僧尼事务就由鸿胪寺直接掌管。从两晋十六国时期开始，佛教已发展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统治者也开始加强管理。于西元四五世纪之交，中国南北两方分裂政权中的东晋、拓跋魏和姚秦先后正式设置了僧官。其中，东晋的僧官创设于安帝隆安五年（401）以前，中央僧官机构泛称为僧司。拓跋魏的僧官始设于太祖皇始年间（396~397），最高僧官称为道人统。僧官作为世俗政权附庸的色彩特别鲜明。东晋以来，寺院由纯粹宗教共同体演变为含有政治、经济性质的社会组织，寺主等僧职逐渐由代表僧众意愿的公职人员演变为代表官府管辖寺院的官员。其后的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一直传承僧官制度，至中华民国成立，才被废除。

除了上述统治者对佛教的利用，中国历史上还曾发生过四次由封建帝王发动的

灭佛运动，号称“三武一宗”法难。“三武”，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及唐武宗李炎。“一宗”，指后周世宗柴荣。四次法难对中国佛教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大多数的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都是既利用又限制的，但当佛教影响国家利益的时候，就会选择打击佛教来保证国家利益。

## 五 结语

悟达国师一生经历的五代皇帝，既有对其尊重有加，护持佛法的，也有打击佛教，毁灭佛法的。但不管是遇到何种境遇，知玄都不卑不亢，始终保持与皇权和宰辅大臣的良好沟通，用佛法去影响他们。正是因为知玄当时结交士大夫阶层，与裴休等重臣交往，并在恰当的时机被举荐，与皇帝接触，才使得其能很好地借助上层政治力量弘扬佛法。哪怕后来遭遇灭佛危机，知玄仍然与某些信仰佛法的大臣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为日后恢复佛教埋下了伏笔。唐武宗逝后，唐宣宗即位，开始恢复佛教，此时知玄被平时相交甚好的杨汉公举荐，出面负责主持恢复佛教。悟达国师知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经历了皇权支持佛教发展，佛教被王权打击毁灭，帝王重新重视佛教、恢复佛教的过程。从某一个角度来看知玄的经历与中国佛教兴衰交替的发展规律有很多相似之处。

纵观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佛教的慈悲、包容精神和因果理念，让中国的历代帝王都无法回避与舍弃佛教。政治的强权、专制，也让佛教不得不依附于它。可以说，佛教与中国历代政权的关系都是一种相互依附和相互利用的关系。

其实佛教与政治在某些地方也有很多可以融合和会通的点，比如政治是管理人，维护社会稳定，佛教是统摄众生，净化法界；政治是希望国富民强，佛教是希望众生解脱安乐；政治是通过暴力手段纠正错误，佛教则慈悲教化，摄心为戒；政治力量可以保卫国家，佛教法力可以庇佑苍生；政治法则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制，佛教是实法，因教、因法、因缘而定；政治希意征服统治世界，佛教则是引导净化法界。庐山慧远大师曾说“道固自教源，济俗亦为要务。”<sup>①</sup>佛教与政治是分不开的，

<sup>①</sup> 《弘明集》卷11，《大正藏》第52册，第69页中。

佛法想要传播必然要借助政治，而政治想要开明也需要佛法的智慧，国泰民安，世界大同何尝不是佛教“人间净土”的一种实现呢？所以两者唇齿相依，关系密切。当今社会，我们以史为鉴，正确处理好佛教与国家政治的关系，至为重要。出家人虽然出家了，但是并没有远离自己的国邦，也没有抛弃自己的责任，爱国不分你我他、方内方外，国家和乐、安康也需要广大佛教徒的积极投入。佛教的智慧、教理可以净化人心，改善社会风气，佛教在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也贡献了一份独特的力量。证诸历史，佛教愈弘扬的时代，国运就愈昌隆；同样的，国家富强，政治清明，佛教才能兴盛。佛教离不开政治，政治也离不开佛教，佛教与政治只有正确地处理好彼此的关系才能共同繁荣，共同发展。